

马克思恩格斯珍贵文献 在日本的典藏、早期传播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盛福刚/文

[提 要] 马克思恩格斯珍贵文献在日本的典藏相当丰富。马克思恩格斯珍贵文献的收集为日本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文章梳理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德文首版的出版过程,以及这些珍贵文献在日本的典藏状况,介绍了上述经典著作在日本的早期翻译和传播情况,及其对我国早期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 日本 珍贵文献典藏 翻译和传播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作为西学东渐的一个支系传入日本。1920年代初,一批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借留学欧洲的契机收集购入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珍稀版本,其中不乏马克思生前的签名赠书。马克思恩格斯珍贵文献的收集为日本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一、马克思恩格斯珍贵文献 在日本的典藏

(一)《共产党宣言》德文首版及其在日本的典藏

《共产党宣言》首次公开出版于德国革命前夕的1848年2月。迄今为止,可以列为首版

考察对象的《共产党宣言》德文单行本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单行本因有23个印刷页,被学界称为“23页本”。该单行本封面上的德文标题为“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标题下方依次印有出版年月“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1848年2月出版),呼吁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口号“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出版地“London”(伦敦);此外,最下方的三行小字分别印有印刷地点和印刷者“Gedruckt in der Office der „Bildungs - Gesellschaft für Arbeiter“ von J. E. Burghard”(J. E. 布格哈特印刷于“工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MEGA²视域下的东亚《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传播史研究”(17CZX008)的阶段性成果。

人教育协会”办公室)以及出版地址“46, Liverpool Street, Bishopsgate”(利物浦大街46号,主教门)等信息,没有标明作者。第二种单行本因有30个印刷页,被学界称为“30页本”。其封面上印刷的出版信息与“23页本”相同。第三种单行本有24个印刷页,因印刷所为“R. Hirschfeld”(R. 希尔施菲尔德),故被学界称为“希尔施菲尔德版”。其封面上除德文标题、出版日期和出版地与上两个版本相同外,下面两行分别印有“Druck von R. Hirschfeld, English & Foreign Printers”(R. 希尔施菲尔德印刷,英文和外国出版),“48, Clifton Street, Finsbury Square”(克里夫顿大街48号,芬斯伯里广场),最下方还标有年份“1848”。

除上述三种单行本外,《共产党宣言》还曾于1848年3月3日至7月28日分13次间断性地连载于每周五出版的《德意志伦敦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其中第一章刊载于第153、154、156、158期,第二章刊载于第159、160、162期,第三章刊载于第165、166、167、171、172期,第四章刊载于第174期。首期刊载时,标题为“Manifest der Communistischen Partei”,从第2期开始改为“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关于上述四个版本中哪个版本能称为《共产党宣言》德文首版的问题,国际学界有过相关探讨。

首先来看沃尔夫冈·迈泽尔(Wolfgang Meiser)对“希尔施菲尔德版”印刷者的考证。通过详细考证,迈泽尔认为该版本极有可能是《福格特先生》单行本出版后于1861年前后再版印刷的版本,理由如下:(1)R. 希尔施菲尔德印刷所首次启用伦敦的地址(48, Clifton Street, Finsbury Square)是在1856年,而1861年12月4日出版的《泰晤士报》曾在第6页第三栏刊登过该印刷所破产的消息,由此可以推断“希尔施菲尔德版”《共产党宣言》的印刷时间并非其封面上标注的1848年2月,而是

1856年至1861年间;(2)1860年秋天出版的《福格特先生》单行本的印刷所同为R. 希尔施菲尔德,马克思在该书中抨击古斯塔夫·阿道夫·泰霍夫时曾多次引用《共产党宣言》,因而有可能是为了扩大影响,马克思以此为契机选择在R. 希尔施菲尔德印刷所再次印刷了《共产党宣言》;(3)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在1897年回忆《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时提到的“1860年代由共产主义者同盟出版的第二个伦敦版”^①指的正是“希尔施菲尔德版”。^②迈泽尔基于上述理由推断,“希尔施菲尔德版”《共产党宣言》极有可能是该印刷所在《福格特先生》单行本出版后于1861年前后再版印刷的版本。

其次来看“《德意志伦敦报》连载版”的底本是“23页本”还是“30页本”的问题。根据托马斯·库钦斯基(Thomas Kuczynski)的考察,这两个版本存在158处差异。其中,“《德意志伦敦报》连载版”承袭“23页本”的有130处,与“30页本”一致的地方只有27处,而且多是一些对“23页本”排版失误的订正,如将“Verhältnisse”订正为“Verhältnisse”。^③日本学者服部文男在库钦斯基考察的基础上,发现了一处可以印证三个版本传承关系的排版失误:《共产党宣言》手稿中的术语原本为“heilige”(神圣的),“23页本”将“l”误排为“t”,变成了在德文中不构成任何语义的“heitige”。“《德意志伦敦报》连载版”将这一失误进一步讹变为“heutige”,由此,手稿中表征“神圣的”语义的“heilige”在“《德意志伦敦报》连载版”中讹变为表征“当今的、今日的”语义的“heutige”。

^① Friedrich Leßner, “Aus der Entstehungszeit des kommunistischen Manifests. Persönliche Erinnerungen”,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H. 1, 1897, S. 558.

^② Wolfgang Meiser, “Das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om Februar 1848: Zur Entstehung und Überlieferung der ersten Ausgaben”, *MEGA Studien*, 1996/1, S. 66-107.

^③ Thomas Kuczynski, “Interessante Informationen über die Erstausgabe. Zum 140. Jahrestag des Erscheinens des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Probleme des Friedens und des Sozialismus*, H. 3, Jg. 31, Prag, 1988, S. 424-426.

而“30页本”承袭了“《德意志伦敦报》连载版”中的失误,将“heilige”排版为“heutige”。由此,可以推断出《共产党宣言》1848年出版的三个版本之间的传承关系,即“23页本”→“《德意志伦敦报》连载版”→“30页本”。^①

最后来看关于“30页本”出版时间的推断。1932年出版的MEGA¹第I部分第6卷收录了《共产党宣言》,该卷编辑认为,1848年上半年在伦敦出版的“30页本”订正了20余处“23页本”中的排版错误,两个版本都可以视作《共产党宣言》的德文首版。但是,据迈泽尔推断,“30页本”并非1848年2月出版于伦敦的版本的改订再版,而是1850年末至1851年初出版于德国科隆的德文新版。^②

上述考证表明,1848年2月出版于伦敦的“23页本”可能是《共产党宣言》唯一的德文首版,同时也是1848年3月至7月间“《德意志伦敦报》连载版”的底本,而“30页本”和“希尔施菲尔德版”都是从“23页本”中衍生的德文新版。

在此基础上,日本学者桥本直树考察了作为《共产党宣言》德文首版的“23页本”现存于世的情况。他发现,“23页本”共经过4—5次加印,存在7—8种印刷异本,首个印刷异本还将第17页的页码误印成了第23页。目前,“23页本”共存世27本,分别保存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图书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德国的拜仁州立图书馆、汉堡州立图书馆、汉堡州立大学图书馆,俄罗斯的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以及日本的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珍本图书室。据桥本考证,庆应义塾大学收藏的“23页本”是1939年7月通过丸善书店购入的,当时购入的价格是1日元70钱。^③

除此之外,日本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的藏书中有—册“希尔施菲尔德版”《共产党宣言》,此书为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长约翰尼·辛里奇森(Johnny Hinrichsen)于1921年赠予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栉田民藏的珍贵版本,扉页上印有“Archiv der S. P. D.”

(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典藏印章。辛里奇森在签名赠书时认为此书是《共产党宣言》的德文首版,因此日本学界曾一度将“希尔施菲尔德版”视作《共产党宣言》德文首版。

(二)《资本论》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珍稀版本在日本的典藏

《资本论》第1卷德文首版于1867年由德国汉堡的迈斯纳出版社出版。1867年9月12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曾抱怨出版社的拖延,称将最后的校样寄给莱比锡即将满四周,但仍未收到样书。^④殊不知,出版社已于马克思寄信的前一天(9月11日)开始邮寄,并于9月14日在《德国书报业行市报》上刊载了《资本论》第1卷出版的消息。马克思从曼彻斯特恩格斯的居所回到伦敦后,收到了迈斯纳出版社寄来的《资本论》第1卷样书,并于9月18日开始向亲朋好友邮寄签名赠书。

马克思生前修订出版的《资本论》版本还有德文第2版(1872—1873年)和法文版(1872—1875年)。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根据德文第2版和法文版出版了德文第3版(1883年)、英文版(1887年)以及根据第3版修订的德文第4版(1890年)。此外,恩格斯还根据马克思的遗稿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2卷首版(1885年)、第2卷第2版(1893年)以及《资本论》第3卷(1894年)。除马克思恩格斯生前编辑出版的版本外,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卡

① 服部文男:「『共产党宣言』の誕生」,载『マルクス探索』,新日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112页。

② Wolfgang Meiser, “Vorbereitungsarbeiten am Textkomplex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für die MEGA”,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H. 22, Berlin 1987, S. 117—128.

③ 橋本直樹:「慶応図書館所蔵の『共产党宣言』初版について」,载『三田学会雑誌』2019年第112卷第1号。此外,桥本还考察发现,“30页本”《共产党宣言》德文版现存世8本,参见橋本直樹:「『共产党宣言』普及史序説」,八朔社2016年版,第22—45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1—352页。

尔·考茨基曾于1914年编辑出版过《资本论》大众版,至1929年共增印了9次;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弗拉基米尔·阿多拉茨基也曾于1932—1934年间编辑出版过《资本论》大众版。

《资本论》第1卷德文首版印刷了1000册,现存于世约100册,其中包括带有作者亲笔签名的赠书15册。据大村泉考察,日本各大学、研究机构 and 私人收藏的《资本论》第1卷德文首版多达50册,占全世界典藏量的半数,大村列举的收藏单位包括东北大学(2册)、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3册)、庆应义塾大学(2册)、京都大学(3册)、大阪市立大学(3册),其中4册有马克思的亲笔签名,分别为:(1)题赠女儿家庭教师卡罗琳·舍勒尔(Calolina Schöller)的签名本,藏于小樽商科大学图书馆,为原校长大野纯一于1930年2月在柏林留学时花费500马克从旧书店购入;(2)题赠友人西吉斯蒙德·波克罕的签名本,藏于东北大学图书馆;(3)题赠路德维希·库格曼医生的签名本,藏于二战前为研究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做出重要贡献的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图书馆,为栉田民藏于1921年在德国为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收集文献时购入;(4)题赠表兄弟奥古斯特·菲利浦斯(马克思曾为出版法文版《资本论》向他寻求过资助)的签名本,藏于关西大学图书馆。

《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印刷了3000册,法文版印刷了1万册。据松田博考察,日本共收藏德文第2版43册,包括东北大学(2册)、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3册)等32家机构;另有27家机构收藏法文版31册,其中东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1873年12月30日马克思题赠英国牧师C.帕斯卡尔(C. Pascal)的法文版《资本论》签名本尤为珍贵,书中除写有马克思赠予帕斯卡尔的献辞外,还留有河上肇题赠弟子栉田民藏的献辞。此书由东北大学法文学部副教授堀经夫于1923—1925

年间留学伦敦时购入,并为答谢师恩赠予河上肇,后者为此备注了“1925年9月23日堀经夫作为留学欧洲纪念赠予”的字样。1932年,河上肇为躲避当局追捕,曾在栉田民藏位于东京的家中避难,为答谢而将此书提上“拜呈栉田学兄河上肇”的献辞赠予栉田民藏。栉田民藏去世后,东北大学图书馆于1935年接手了包括此书在内的约7000册藏书,并为此设立了“栉田民藏文库”。

东北大学图书馆的“栉田民藏文库”还藏有其他马克思恩格斯珍贵文献,其中一本是《哲学的贫困》法文首版(1847年),后经东北大学经济学部田中菊次教授鉴定为马克思的自用本,书中留有马克思为修订法文版写下的标注。此书是栉田民藏于1921年7月27日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获取,在扉页上写有“27. VII. 1921, Berlin Aus dem Archiv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T. Kushida”的字迹。如同“希尔施菲尔德版”《共产党宣言》,此书应该也是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馆长辛里奇森赠予栉田民藏的,内封上印有“Bibliothek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的藏书印章。收录《哲学的贫困》的MEGA¹第I部分第6卷曾在《序言》中提及此书,其典藏信息后来作为865号文献编入了收录《马克思恩格斯藏书目录》的MEGA²第IV部分第32卷。

“栉田民藏文库”中的另一本珍稀版本是由希尔施菲尔德出版的《福格特先生》德文首版,书中写有1860年11月29日马克思于伦敦题赠恩格斯的献辞“Seinem F. Engels London. 29. Nov. 1860 K. Marx”。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德文首版及其在日本的典藏

1921年1月,苏共中央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主要任务是收集和典藏与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的原始手稿、复印件、书籍以及生平资料等珍贵文献。研究院成立后,首任院长达维德·梁赞诺夫受列宁委派多次亲赴欧洲,花

重金收集或复制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1925—1926年间,研究院在法兰克福设立事务所,复制了藏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和大量照片。至1930年,研究院收藏了各类马克思主义文献原件共计1.5万份,复印件共计1.75万份。

在此基础上,梁赞诺夫于1926年创办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机关刊物《马克思恩格斯文库》,旨在用德文公布马克思恩格斯未刊手稿和研究论文。《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德文版出版地设在法兰克福,共出版了两期。第1期出版于1926年,除收录了由梁赞诺夫编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外,还收录了1881年2—3月间维拉·查苏利奇与马克思的通信,以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劳工运动史的研究论文。第2期出版于1927年,主要收录了由梁赞诺夫编辑的恩格斯著作《自然辩证法》。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期中的“费尔巴哈”章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首个德文版本,被称为“梁赞诺夫版”。梁赞诺夫在《编者序言》中列表对比了恩格斯标注的纸张页码(Bogennummern)与马克思重新编排手稿时标注的页码(Seitennummern),并按马克思标注的页码编排了手稿。另外,他还在正文中复原了部分改稿异文,并在脚注中注明了马克思的笔迹。“梁赞诺夫版”开启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版编辑出版史的百年历程,使得这份手稿在写成80年后首次得以面世。

继《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后,梁赞诺夫策划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¹)的出版,原计划分三部分共出版42卷,并于1927年至1933年出版了11卷(12册)。作为梁赞诺夫继任者的阿多拉茨基于1931年出任改组后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并在1932年编辑出版了收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MEGA¹第1部分第5卷。这是首个收录包括“鲍威尔”章和“施蒂纳”章在内全三章手稿的

德文版,被称为“阿多拉茨基版”。“阿多拉茨基版”编排的特点是没按马克思标注的页码顺序,而是将手稿剪切成40余个片段,并按编者理解的逻辑顺序进行了再编辑。这一编辑方法后来受到了国际学界的批评。

“梁赞诺夫版”于1926年出版后旋即传至日本东京,时任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的栉田民藏和森户辰男于当年便完成了“费尔巴哈”章的翻译,并分上、下两部分刊载于长谷川如是闲创刊的杂志《我等》1926年5月号和6月号。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和MEGA¹在日本各研究机构较为常见,以笔者曾经留学过的东北大学为例,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研究的重镇,其图书馆收藏了两套《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和三套MEGA¹。这里,值得介绍的是作为栉田民藏自用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扉页上写有其亲笔签名“T. Kushida 1926, Tokio”,内封上留有“栉田民藏文库”的长方形收藏印章,内有栉田民藏依据这本书翻译日译本时用铅笔写下的备注和各种记号。就《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亚洲的早期翻译和传播而言,栉田民藏和森户辰男的译本可谓首开先河,因此栉田民藏的这一自用本具有重要价值。

二、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在日本的早期翻译和传播

(一)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日本的早期译介

日本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介绍可追溯至明治早期,以引介西方启蒙思想为己任的明六社成员加藤弘之曾在《真政大意》(1870)中批判性地提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另一位明六社成员西周在《社会党论的学说》(1878—1879)中认为社会党的理论是改造人类社会的政党学说。1881年,基督教牧师小崎弘道在《六合杂志》第7期上发表《论近世社会党的原因》一文,首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正如当今德国社会党领袖卡尔·马克思所主张的那样,

现在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产生困难的原因在于所有权法。所有权法是盗窃之法,资本家占有不当利益,劳动者得不到相应的报酬,救赎之道唯有废除现行的所有权法,制定新的社会法。”^①1891年,石谷斋藏在《社会党琐闻》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还意译了《共产党宣言》正文结尾的段落。1893年,曾任日本银行总裁的深井英五在《现时之社会主义》中首次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并译出正文结尾的段落。^②

明治中后期,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堺利彦在日本的报刊杂志上零星地译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述,此后他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主力。1910年,日本发生了暗杀天皇的“大逆事件”,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受此牵连于次年被判处死刑,处于萌芽期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文献编译事业随后进入了寒冬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工业迅猛发展并很快占领了亚洲市场。然而,伴随着产业工人数量的急剧增加,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日本工人阶级的境遇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劳资冲突日益激化,劳工运动不断高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是进一步推动了日本国内劳工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日本思想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16年,吉野作造开始倡导民本主义。1917年,河上肇出版了《贫乏物语》,推动了大正民主运动的发展。1919年可谓日本马克思主义文献传播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元年,涌现出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长谷川如是闲、大山郁夫、河上肇等人相继创办了《我等》《改造》《社会问题研究》等一批大正民主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左翼期刊,二战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镇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也在这一年应运而生。

河上肇是日本译介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先驱,曾长期执教于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王学文、杜国庠等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都曾师从于他。1919年前后,河上肇由研究边界效用

理论等资产阶级经济学转向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于1919年1月创办了《社会问题研究》杂志。他以这份杂志为阵地,除了译介《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外,还撰写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资本论〉中的唯物史观》等文章,系统地为广大启蒙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知识。在1920年6月出版的第16期《社会问题研究》杂志上,河上肇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唯物史观》一文,将《共产党宣言》中的唯物史观概括为“社会组织进化论”和“精神生活的物质说明”,并以引文形式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将近一半内容,以及介绍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揭示的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

(二)《共产党宣言》在日本的早期翻译和传播

据桥本直树考证,截至2012年,《共产党宣言》共出版了92种日文译本,而1904年11月13日刊登在《平民新闻》第53号上的《共产党宣言》是日本首个比较全面的译本,译者为幸德秋水和堺利彦。^③译者序言介绍说,这个翻译是为纪念《平民新闻》出版一周年而策划的,翻译底本为赛米尔·穆尔(Samuel Moore)翻译、恩格斯校订的英译本(1888年),并参考了女权运动活动家维多利亚·伍德哈尔(Victoria Woodhull)翻译的美国版。这个译本翻译了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以及正文的第一、二、四章,而第三章因刊载时间的紧迫性以及“部分内容已经不符合当时的欧洲政治时局”的原因没有译出。尽管如此,《平民新闻》还是因翻译刊载《共产党宣言》而触及

① 小崎弘道:「近世社会党ノ原因ヲ論ズ」,载『六合雜誌』1881年第7号。

② 参见橋本直樹:「日本における『共産党宣言』の翻訳=影響史について」,载『マルクス・エンゲルス・マルクス主義研究』2006年第47号。

③ 橋本直樹:『『共産党宣言』普及史序説』,第381—401頁。

了当时日本新闻出版条例规定的“扰乱社会秩序”条款,一经出版便遭到查封,译者堺利彦、幸德秋水以及编辑兼发行人西川光次郎也被东京地方裁判所处每人80日元的罚金。

但是,堺利彦并没有因此而屈服,他效仿威廉·李卜克内西在1872年莱比锡叛国罪审判中将《共产党宣言》作为证据材料在法庭上全文朗读的做法,着眼于判决书上“单纯的历史文书作为学术研究资料,即便其内容欠妥、扰乱社会秩序,也可以在报纸杂志上刊载”的判决结论,于1906年3月创办了《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并在第1期上刊载了《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在这个新译本中,他独自补译了第三章,并修订了之前他和幸德秋水共同翻译的部分译文。

“大逆事件”发生后,《共产党宣言》被列为禁书,改造社于1928年至1935年出版的“改造社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没能收录《共产党宣言》。尽管如此,堺利彦还是在1921年以《共产党宣言》德文版为底本,参照河上肇、栉田民藏各自翻译的节译本,采用白话文的文体对1906年的旧译本进行了重译。重译本在大规模调整语序的同时,还将《平民新闻》刊载的译本中的部分汉语词汇改译为片假名。但是,这个译本在战前没能公开出版,存世的只有少量复写本。后来,堺利彦在竞选众议院议员时为了筹措资金,将手稿卖给了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

栉田民藏也曾于1918—1919年间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日文。1919年,他在《我等》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介绍唯物史观的文章,其中关于《共产党宣言》的引文就出自他翻译完成的这个译本。1920年,时任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助手的栉田民藏还曾以“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文书(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评)”为题,将《共产党宣言》第三章发表在东京帝国大学主办的《经济学研究》创刊号上。1930年,劳农书房以“长谷川早太”的名义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全译本,该书很有可能就是栉田民藏未能全文发表的译本。劳农书房在该译本序言中

提到“参考《共产党宣言》德文首版译出”而能参考此书译出《共产党宣言》日译本的,恐怕只有拥有辛里奇森赠予的“希尔施菲尔德版”《共产党宣言》的栉田民藏本人。这是日本现存的唯一一本“希尔施菲尔德版”《共产党宣言》,栉田民藏也一直将该版本视为《共产党宣言》的德文首版。1920年10月至1922年8月,受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委派,栉田民藏和久留间鮫造分别赴德国和英国收集购买资料,带回了一批马克思恩格斯珍贵文献,其中就有上文介绍的马克思亲笔签名赠予库格曼的《资本论》第1卷首版(1867年),以及辛里奇森赠予栉田民藏的“希尔施菲尔德版”《共产党宣言》。

此外,日本内务省警报局为了研究作为其镇压对象的共产主义学说,也曾于1919年和1925年先后两度秘密翻译过《共产党宣言》。

(三)《资本论》在日本的早期翻译和传播

1919年,三种《资本论》译本竞相面世,揭开了日本马克思主义文献出版热潮的序幕。1919年9—12月,东京经济社出版了松浦要翻译的《资本论》第1分册和第2分册,不过只译出了《资本论》第1卷的第一至三篇,且没有注明翻译底本。同年12月,绿叶社出版了以恩格斯编辑版为底本的生田长江译本,这个节译本只收录了第1卷第一至三篇。日本首个《资本论》全译本是“大燈阁版”《马克思全集》第1—9卷(共10册),即1920年6月至1924年7月由大燈阁和而立社出版的高畠素之译本。后来,高畠素之又于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对其译本进行了全面改译,由新潮社推出了3卷4册的新译本。1927年10月至1928年4月,在新潮社版本的基础上,高畠又添加了若干修改,由改造社出版了3卷5册的修订本。“改造社版”《资本论》是高畠素之译本的最终版,也是二战前日译《资本论》的定本。译者高畠素之在“大燈阁版”《资本论》第1卷的“译者序”中称,翻译底本是恩格斯编辑的第6版,同时参照了英译本。

1927年8月,受岩波书店店主岩波茂雄所托,河上肇接受了翻译出版“岩波文库版”《资本论》的任务。为了与改造社的高崑译本竞争,岩波书店在当年10月就出版了河上肇和宫川实共同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但是,随着河上肇与岩波茂雄之间关系的恶化,“岩波文库版”《资本论》在出版了第1卷第5分册(翻译至第3篇第8章)后便中途夭折。随后,这一译本在1931年改由改造社出版,由于时局严峻,也只出版了第1卷上册,收录了《资本论》前12章的译文。河上肇在日译本序言中称,翻译的底本是考茨基编辑的大众版。

(四)《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首个日译本

“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其出版的1926年就被栉田民藏和森户辰男翻译成日文,并以《马克思恩格斯遗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费尔巴哈〉》为标题刊登于《我等》杂志第8卷第5—6号。1930年5月,修订后的译本作为我等社的“我等丛书”第4册付梓出版,书名改为《马克思恩格斯遗稿〈德意志意识形态〉》。

《我等》杂志刊载的栉田民藏和森户辰男翻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初译本,省略了“梁赞诺夫版”的“编者导言”、脚注以及“誊清稿”的前半部分。后经二人修订的“我等丛书”译本则增加了被《我等》杂志译本省略的内容,还发表了由河上肇翻译的《关于费尔巴哈章的提纲》,并转载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中收录的提纲影印件。另外,该译本还译出了“梁赞诺夫版”中的异文,将被删除字句放入括号“◇”中,插入正文进行了复原。

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在日本的

早期传播对中国的影响

(一)经日译本转译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汉译本

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我国的早期翻

译和传播而言,日本这一传入途径不容小觑。例如,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1919年第6卷第5期和第6期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介绍了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下篇介绍了劳动价值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概况。据日本学者考证,上篇的大部分内容译自河上肇的论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下篇的理论来源是福田德三的著作。^①

大村泉认为,陈望道翻译的首个《共产党宣言》汉译本的底本也来自日本,即刊载于《社会主义研究》第1号上的日译本,同时还在参考英译本的基础上修订了日译本的部分误译和漏译,如将堺利彦、幸德秋水译本中误译为“荷兰”的国名“Danish”订正为“丹麦”。^②

一般认为,我国首个《资本论》汉译本是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译者为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回国的陈启修。据笔者考证,陈启修译本系《资本论》第一篇,翻译时参照了河上肇和宫川实共同翻译的“岩波文库版”《资本论》第1—2分册。

由郭沫若翻译、上海言行出版社1938年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首个汉译本。郭沫若在“译者弁言”中称,该译本是以1926年出版的“梁赞诺夫版”德文本为底本编译而成的。据笔者考证,1931年,郭沫若在日本千叶县的家中完成了首个汉译本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1930年5月出版的“我等丛书”日译本。

笔者曾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文)第一版书目》^③,并结合香港中文大学出

^① 斋藤道彦:「李大釗 私のマルクス主義観」,载『桜美林大学中国文学論叢』1970年第2辑。

^② 大村泉:「幸德秋水/堺利彦訳『共産党宣言』の成立・伝承と中国語訳への影響」,载『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雑誌』2009年第603号。

^③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9—436页。

版社出版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对1908—194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汉译本(文)的底本、出版地点以及译者的学术背景进行了详细考察,发现我国国内从1908年至1937年共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文)102种,以日译本为底本转译或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日译本的汉译本占了半数以上,多达61种,出版地点主要在上海。1938年后,以延安为根据地出版的译本明显增多,底本也由日译本逐步转向了俄文版本。

(二)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汉译本对日译概念的借鉴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战败,宣告了以中体西用论为根基的洋务运动的终结。1896年,清政府首次向日本派遣了13名官费留学生,开启了通过日本间接汲取西学的时代。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大量涌入日本,在1906年高峰时期有8000余名中国学生在日留学。这批留日学生不仅学习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还受当时日本大正民主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依据日译本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和研究文献。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早期汉译本的关键术语与日译本近乎一致的最大成因。例如,“生产力”“辩证法”“资本”“劳动力”“共产”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中的关键术语大都取自日译本。

在现代版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日译本和汉译本中,同一个德语概念有时被译作不同的术语。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Nation”概念为例,1996年出版的服部译本依据前后文语境,只有在不能将其译作“国民”或“国家”时,才采用“民族”的译法,而汉译本则将“Nation”的翻译几乎全部修订为“民族”。再如,我们现在将“Eigentum”分别译作“财产”“所有权”“所有制”等,而日译本则将其统一译作“所有”,既可以指称作为物的财产,又可以表征商品内含的私有财产关系。因此,当我国学界为

理解某些马克思主义概念产生争执时,或许日译本可以为我们解读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提供一些借鉴。

(三)由日本进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珍贵文献

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早期编译从欧洲经由日本传入我国,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珍贵文献的典藏也在某种程度上经历了这一过程。据笔者所知,很多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退休后,选择将个人毕生收藏的珍贵文献捐赠给我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例如,曾因“森户事件”与栉田民藏一同辞去教职加入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的大内兵卫之子、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大内力,就将父子二人所藏的1万余卷图书捐赠给了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大内兵卫的弟子、二战后提出以“倾斜生产方式”提振日本经济的有泽广巳,在1986年将个人藏书1.3万余册捐赠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其中就有《资本论》全三卷以及《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德文首版,这些都是他于1926—1928年留学德国时购入的珍贵文献。而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心典藏的文献主体是服部文库,即日本东北大学教授服部英太郎、服部文男两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生前的藏书,以及大村泉、安孙子麟等服部文男门下学者们的捐赠,总量达2万余卷。近几年,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接收了日本关东学院大学原副校长、日本唯物论协会原会长渡边宪正教授捐赠的个人藏书,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接收了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户原四郎的部分藏书,其中包含迄今已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²)的全部卷次。■

[盛福刚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责任编辑 苑洁)